

海岱地区商周时期农业复杂化的植物考古观察

郭荣臻¹ 靳桂云²

(1.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6;

2.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山东青岛 266237)

内容提要:对植物考古证据的综合分析显示,海岱地区商周时期农业经济在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基础上继续发展,作物组合包括粟、黍、稻、小麦、大豆、大麦、荞麦、小豆、红小豆、绿豆、豇豆属、大麻等,不同地域、不同时间阶段的植物考古数据存在统一性和差异性特点,惟麦作强化与稻作弱化的态势不断发展。结合动物考古等其他证据,可以认为商周时期农业复杂化进一步发展,海岱地区也被纳入到早期食物全球化的浪潮中。

关键词:海岱地区 商周时期 作物结构 农业复杂化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植物考古材料对早期农业及其相关问题探研的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考古研究所证实。作为国内植物考古实践重镇,海岱地区史前一两周时期的植物考古工作颇具代表性。但就已有研究来看,与如火如荼开展的史前时期综合研究相较,学界对商周时期海岱地区^[1]植物考古研究则多以遗址个案观察为主,综合探讨偏少,较有代表性的如安静平曾据植物考古证据对岳石文化至西周时期农业和野生植物利用进行了观察,注意到了农作物和杂草关系,并对野生植物资源的作用进行了剖析^[2];魏娜则将研究视角集中于胶东地区的农业活动和野生植物利用问题,所研究问题与安氏有所相似,惟其资料更新,且地域仅限于胶东地区^[3]。前述研究虽关注了山东地区商周农作物组合,但对作物构成的讨论偏少,也没有涉及近年新刊植物考古研究资料,且未曾提及农业复杂化、农业地理等相关问题。有基于此,对海岱地区商周时期农业相关问题的继续探讨尤

有必要。本文拟以植物考古材料为中心讨论海岱地区商周农业地理状况,在此基础上管窥当时的农业复杂化进程。

一、海岱地区商周时期植物遗存的考古发现

随着植物考古方法的推广普及,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发掘中开展了以植物考古为代表的多学科合作研究。就海岱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工作而言,胶东、鲁东南、鲁中南、鲁西南、鲁北等区域皆有植物遗存出土(图一、表一),但不同区域、不同时段、不同聚落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并不均衡。

(一)胶东地区

根据目前已有考古发现,本区出土有商代植物遗存的遗址仅山东烟台龙口楼子庄^[4]1处。植物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两周时期遗址,计有龙口归城^[5]、青岛北阡^[6]、河南庄^[7]、龙泉河东^[8]等4处。

(二)鲁东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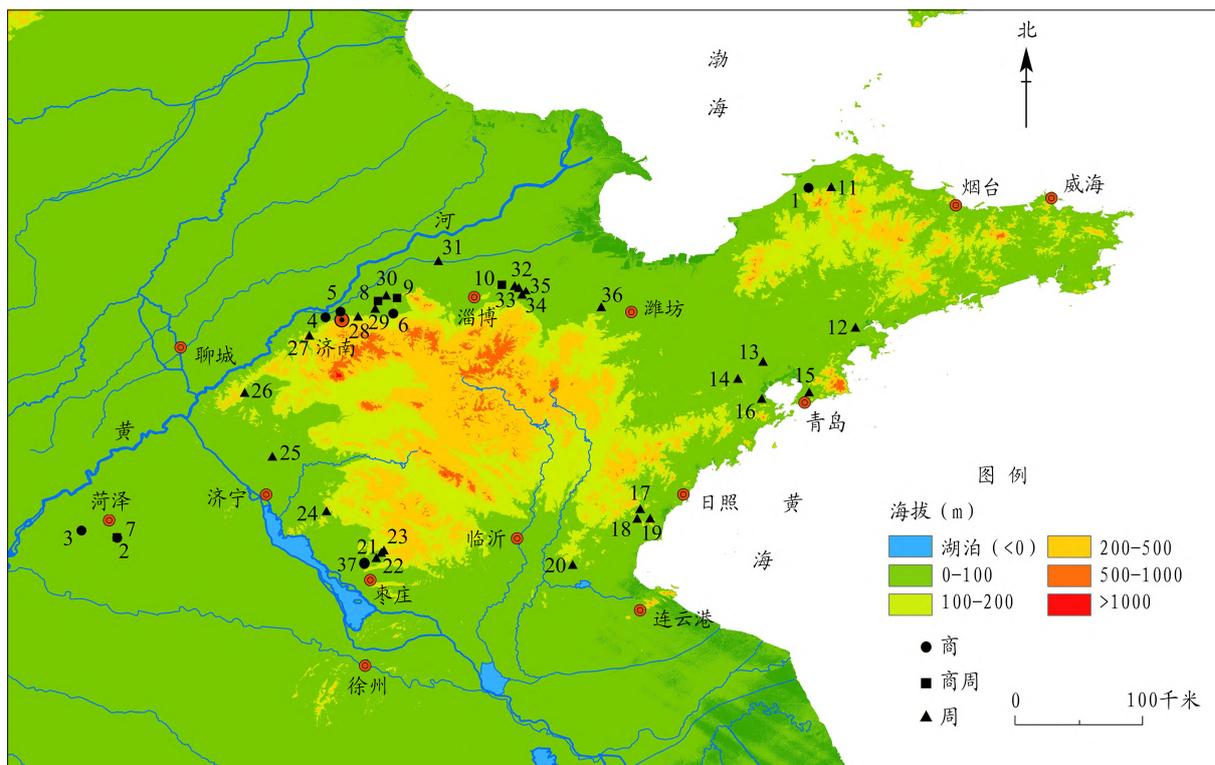
本区商时期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暂付阙如,两周时期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也为数不多,计有

收稿日期 2022-07-29

作者简介 郭荣臻(1988—),男,中国国家博物馆科研工作站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夏商考古、环境与生业考古。

靳桂云(1964—),女,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时代考古、环境与生业考古。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山东大学环境与社会考古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开放课题“中原与海岱地区夏商时期农业复杂化的比较研究”(JolnRLESA2022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环境与农业的鲁北地区龙山文化人地关系研究”(41771230)的资助。



图一// 海岱地区商周时期作物遗存出土地点分布图

1. 楼子庄 2. 青邱垆堆 3. 十里铺 4. 刘家庄 5. 大辛庄 6. 马安 7. 十里铺北 8. 黄桑院 9. 榆林 10. 桐林 11. 归城
12. 北阡 13. 河南庄 14. 周王庄 15. 赵家庄 16. 龙泉河东 17. 辛留 18. 六甲庄 19. 纪家沟 20. 东盘 21. 北台上 22. 孟庄
23. 东江 24. 邾国故城 25. 西吴寺 26. 张沟 27. 催马庄 28. 唐冶 29. 城子崖 30. 宁家埠 31. 陈庄 32. 后李 33. 粉庄
34. 阙家寨 35. 东古城 36. 都北 37. 前掌大

胶州周王庄^[9]、赵家庄^[10]，临沭东盘^[11]，日照辛留、纪家沟^[12]、六甲庄^[13]等6处。

(三)鲁中南地区

本区商时期的系统植物考古研究暂付阙如，但滕州前掌大稳定碳氮同位素工作指向了商至西周时期先民的食物结构^[14]。两周时期诸遗址中，出土有植物遗存者以东周为主，计有邹城邾国故城^[15]，济宁西吴寺^[16]，枣庄东江^[17]，滕州北台上^[18]、孟庄^[19]等5处。

(四)鲁西南地区

本区商周时期诸遗址中，开展过系统植物考古工作的为数较少。已刊材料中，除菏泽十里铺、青邱垆堆考古调查所获植物遗存外^[20]，另有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菏泽十里铺北遗址^[21]所获植物遗存值得关注。需要说明的是，菏泽青邱垆堆遗址近年发掘所获植物遗存较为丰富，由于研究结果尚未正式公布，本文未能参引。

(五)鲁北地区

海岱地区商周时期诸遗址中，以鲁北地区的植物考古研究为数最多，已刊材料有济南大辛庄^[22]、刘家庄^[23]、黄桑院^[24]、马安^[25]、宁家埠^[26]、催马庄^[27]、唐冶^[28]、城子崖^[29]、榆林^[30]、平阴张沟^[31]，淄博高青陈庄^[32]、桐林^[33]、齐故城阙家寨^[34]、东古城^[35]等，另有少数遗址如淄博后李、粉庄、昌乐都北等浮选结果鉴定工作也已完成^[36]，从中获取了较多植物遗存。济南王府遗址^[37]的植硅体样品中未见作物遗存。

二、海岱地区商周时期的作物结构

作物结构是历史农业地理的重要内容，包括作物组合与构成两方面内容（“作物组合”指的是作物的种类组成，“作物构成”则专指作物的比重关系），对于判断一个地区一定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有重要作用。既往研究显示，开展过系统植物考古工作的遗址中，粮食作物的数量比

例、出土概率皆高于非粮食类其他植物遗存,暗示了时人对不同植物资源的利用策略。在承认植物遗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人的食物资源利用乃至食物生产的前提下,对以粮食为代表的

作物遗存进行量化比对,可以进一步判断时人的农业经济状况。

(一)胶东地区

商代晚期楼子庄遗址的 H6 中出土有若干炭

表一// 海岱地区商周时期植物遗存简表(单位:份)

区域	遗址名称	文化时代	研究性质	工作方法	样品	粮食作物	其他作物
胶东	楼子庄	晚商	非系统	发掘/不详	1	黍	
	归城	西周一春秋	系统	发掘/浮选	20	粟、黍、小麦	
	龙泉河东	西周	系统	发掘/浮选	33	粟、黍、稻、小麦、大豆、赤豆	大麻
	河南庄	西周一战国	系统	发掘/浮选	9	粟、黍、稻、小麦、大豆、赤豆	
	北阡 2007	春秋	系统	发掘/浮选	101	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	
	北阡 2007—2013	春秋	系统	发掘/浮选	537	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赤豆、绿豆、豇豆属	大麻
鲁东南	周王庄	西周	系统	发掘/浮选	68	粟、黍、大豆	
	赵家庄	春秋	非系统	发掘/浮选	3	粟、小麦	
	东盘	西周	系统	发掘/浮选	14	粟、黍、稻、小麦	
		春秋	非系统	发掘/浮选	1	稻、小麦	
	辛留	西周	非系统	调查/浮选	1	小麦	
	纪家沟	西周	非系统	调查/浮选	1	粟、小麦、大豆	
六甲庄	东周	非系统	发掘/浮选	3	稻		
鲁中南	前掌大	商	非系统	发掘/同位素	3	粟黍等 C ₄ 、稻麦等 C ₃	
		西周	非系统	发掘/同位素	31	粟黍等 C ₄ 、稻麦等 C ₃	
	邾国故城 2015	春秋	系统	发掘/浮选	24	粟、黍、稻、小麦、大豆、小豆	
		战国	系统	发掘/浮选	117	粟、黍、稻、小麦、大豆、小豆、大麦、荞麦	
	邾国故城 2017	春秋	系统	发掘/浮选	74	粟、黍、稻、小麦、大豆、小豆、绿豆	
		战国	系统	发掘/浮选	107	粟、黍、稻、小麦、大豆、小豆、绿豆	
	北台上	战国—汉	系统	发掘/浮选	54	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小豆	大麻、紫苏
	东江	春秋	系统	发掘/浮选	55	多种作物	
		战国	系统	发掘/浮选	104	多种作物	
	西吴寺	西周一春秋	非系统	发掘/偶见	不详	炭化谷物	
非系统			发掘/孢粉	2	小麦、禾本科作物		
孟庄	春秋	非系统	发掘/植硅体	6	粟、黍、稻、小麦		
鲁西南	十里铺北	商	系统	发掘/浮选	106	粟、黍、稻、小麦、大豆	
		东周	系统	发掘/浮选	45	粟、黍、稻、小麦、大豆、红小豆	
	十里铺	商	非系统	调查/浮选	1	粟	
	青邱垌堆	商	非系统	调查/浮选	1	粟	

续表一

区域	遗址名称	文化时代	研究性质	工作方法	样品	粮食作物	其他作物
鲁北	大辛庄 2003/2005	商	系统	发掘/浮选	165	粟、黍、稻、小麦、大豆	大麻
	大辛庄 2003	商	系统	发掘/植硅体	18	粟、黍、稻	
	大辛庄 2010	商	系统	发掘/浮选	165	粟、黍、稻、小麦、大豆	
	刘家庄	商	系统	发掘/浮选	128	粟、黍、小麦、大豆	
				发掘/同位素	20	粟黍等 C ₄ >小麦等 C ₃	
	黄桑院	商周	系统	发掘/浮选	6	粟、黍、小麦	
	榆林	商	系统	发掘/浮选	6	多种作物	
		东周	系统	发掘/浮选	30	多种作物	
	马安	商	非系统	调查/浮选	1	粟、黍、小麦	
	桐林	商	非系统	发掘/浮选	4	粟、黍、稻	
		商周	非系统	发掘/浮选	4	粟、黍、稻	
		西周	非系统	发掘/浮选	1	未见	
		周	系统	发掘/浮选	9	粟、黍、稻	
	宁家埠	商周	非系统	发掘/浮选	2	粟、黍、大豆	
		东周	系统	发掘/浮选	8	粟、黍、大豆	
	催马庄	西周	系统	发掘/浮选	5	粟、黍	
			非系统	发掘/植硅体	1	粟、黍	
	唐冶 2006	西周	系统	发掘/浮选	23	粟、黍、小麦、大豆	
	唐冶 2014	西周	系统	发掘/浮选	124	粟、黍、稻、小麦、大豆	大麻
	城子崖	东周	系统	发掘/浮选	54	多种作物	
	陈庄	西周	系统	发掘/浮选	75	粟、黍、稻、小麦、大豆	
		东周	非系统	发掘/浮选	2	粟、黍、小麦	
	阚家寨	春秋	非系统	发掘/浮选	1	粟、黍、稻、大豆、小豆	
		战国	系统	发掘/浮选	6	粟、黍、稻、小麦、大豆、小豆	
	东古城	春秋	系统	发掘/浮选	19	粟、黍、小麦、小豆	
		战国	系统	发掘/浮选	45	粟、黍、稻、小麦、大豆、小豆	
后李	周	系统	发掘/浮选	—	多种作物		
粉庄	东周	系统	发掘/浮选	—	多种作物		
都北	东周	系统	发掘/浮选	—	多种作物		
张沟	春秋	非系统	发掘/植硅体	1	粟、黍、小麦		
王府	春秋	非系统	发掘/植硅体	15	未见		

化黍粒,指向了时人对此类小米资源的利用甚至黍作农业的发展。西周时期的龙泉河东遗址所出粮食在五谷基础上增加了赤豆;构成方面,以粟和小麦所占比重最高,黍与大豆次之,余者比重较低。西周一战国时期的河南庄遗址粮食组合与之相似;构成方面,亦以粟和小麦为主,黍、豆再次,稻最低。西周一春秋时期的归城遗址所出粮食仅粟、黍、小麦;构成方面,粟和小麦相当,黍较

表二// 胶东地区两周时期诸遗址粮食作物量化信息表(%)

作物种类	归城遗址			龙泉河东遗址			河南庄遗址			北阡遗址		
	数量比例	重量比例	出土概率	数量比例	重量比例	出土概率	数量比例	重量比例	出土概率	数量比例	重量比例	出土概率
粟	n=85	7.48	n=20	n=2974	n≈89	n=33	n=578	n≈10	n=9	n=26560	n=564	n=537
黍	55.29	0.32	55	39.91	4.05	100	71.63	13.14	89	57.59	8.14	86
稻	1.18		5	0.55	0.11	24	2.08	0.76	56	6.57	1.86	48
小麦	43.53	92.2	55	0.03	0.02	3	0.17	0.23	11	0.47	0.48	9
大麦				59.18	93.97	91	23.7	68.1	100	32.27	71.46	80
大豆				0.3	1.74	18	0.69	7.19	33	0.6	1.02	14
赤豆				0.03	0.11	3	1.73	10.58	33	1.96	15.68	28
绿豆										0.1	0.48	3
豇豆属										0.38	0.72	4
										0.06	0.16	1

低。东周时期的北阡遗址,粮食组合除前述六者外,另有,绿豆及其他豇豆属、大麦等植物;构成方面,粟与小麦比重最高,黍次之,大豆再次,余者较低(表二)。此外,龙泉河东、北阡遗址出土有零星的大麻籽粒。

胶东地区两周时期粮食组合多达9种,惟不同聚落的作物类别略存差异。构成方面,诸遗址植物考古数据呈现出一定相似性,皆以粟和小麦的比重为高,黍、大豆次之,稻、大麦、其他豆类比重较低。与本区岳石文化乃至龙山文化相较,商周时期以粮食为主的植食资源利用方式有相似之处。就所利用的植物性食物资源来看,商周时期的粮食在粟、黍、稻、小麦、大豆等五谷和大麦基础上,增加了小豆、绿豆及其他豇豆属作物,作物种类的增多指向了农业种植的发展与农耕技术的进步。比重方面,两周时期一改既往以粟、黍为主、大豆和稻为辅的作物结构,代之以粟和小麦为主、黍和大豆为辅的新态势,暗示着农业生产中麦作的强化与稻作的弱化。

(二)鲁东南地区

西周时期的周王庄遗址所出粮食有3种,构成方面以粟为主,黍次之,大豆最低。东盘遗址所出作物有4种,构成方面以小麦占优,稻次之,粟、黍较低(表三)。纪家沟、辛留遗址粮食种类虽少,但皆出土有小麦。东周时期的植物遗存皆非系统植物考古研究所获,赵家庄遗址出土有粟和小麦,东盘遗址出土有稻和小麦,六甲庄遗址则仅见稻。

与胶东地区相比较,本区植物遗存的丰富度稍低,且不同遗址间的差异更大。西周时期作物组合仍为五谷,粟和小麦的遗址覆盖率较高,单个遗址作物的构成中,粟与小麦也占据优势。囿于发现,目前仅知东周时期的粮食组合为粟、稻、小麦,尚难对此结果加以量化。北辛一大汶口文化时期,本区先民的农业生产已呈现出稻粟兼作特点,海岱龙山—岳石文化时期,多种作物结构与多种植食资源利用成为本区的时代特征,对两周时期的作物结构有一定影响。

(三)鲁中南地区

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的西吴寺遗址,个别灰坑底部曾出土有炭化谷物,由于当时浮选法尚未在国内普及,有限的炭化植物遗存系发掘中的偶然发现,且原报告中未公布其具体种属,但孢粉记录揭示了小麦乃至其他禾本科作物的存在。春秋时期,邾国故城遗址所出粮食除五谷外,另有

表三// 鲁东南地区两周时期诸遗址粮食作物量化信息表(%)

作物种类	周王庄遗址			东盘遗址		
	数量比例	重量比例	出土概率	数量比例	重量比例	出土概率
	n=193	n≈2	n=68	n=157	n≈7	n=14
粟	92.23	47.85	54.41	6.37	0.47	18.2
黍	6.22	6.45	5.41	1.92	0.3	18.2
稻				11.46	6.22	54.5
小麦				80.25	93.01	72.7
大豆	1.55	45.7	2.7			

表四// 鲁中南地区东周时期诸遗址粮食作物量化信息表(%)

作物种类	邾国故城1			邾国故城2			北台上遗址		
	数量比例	重量比例	出土概率	数量比例	重量比例	出土概率	数量比例	重量比例	出土概率
	n=1078	n≈47	n=24	n=8184	n≈191	n=117	n=3527	n≈31	n=54
粟	37.85	2.61	54.2	73.41	9.46	81.2	91.72	32.27	87.04
黍	0.37	0.05	4.2	1.48	0.38	23.1	3.15	2.21	31.48
稻	0.46	0.23	4.2	0.05	0.05	3.42	1.36	5.01	15
小麦	49.91	53.96	50	16.63	33.59	81.2	0.57	3.13	20.37
大麦				0.02	0.04	1.71	0.03	0.12	1.85
荞麦				0.01	0.02	0.85			
大豆	10.58	41.35	33.3	6.82	49.81	41.9	2.44	48.62	9.26
小豆	0.74	1.71	20.8	1.53	6.56	29.9	0.74	8.65	16.67
绿豆	0.09	0.09	4.17	0.05	0.08	1.71			

注：“邾国故城1”指邾国故城春秋时期浮选结果，“邾国故城2”指邾国故城战国时期浮选结果。

小豆；构成方面，粟和小麦比重最高，豆次之，黍最低。东江遗址的浮选结果尚未公开，但该遗址春秋时期的作物结构与邾国故城相似。孟庄遗址的植硅体分析也揭示了多种作物的存在。战国时期，邾国故城遗址所出粮食在此前基础上增加了大麦、荞麦；构成方面变化不大，仍以粟和小麦比重为最高。战国—汉时期的北台上遗址所出作物种类与邾国故城相似，但不见荞麦；构成方面，粟的比重最高，黍次之，大麦最低，余者介于黍和大麦之间(表四)。战国时期东江遗址的作物组合与邾国故城、北台上遗址有相似之处。

与鲁东南地区相较，本区作物种类丰富程度高。西周时期存在对作物的利用行为。春秋至战

国的作物种类有所增加，粮食作物的高比重显示了农业的发展及先民的植食资源利用状况。与胶东地区相似，粟和小麦的比重较高，豆类作物次之，黍再次，稻遗存遗址覆盖率及比重的偏低现象可能意味着稻作在农业生产中的弱势或先民对稻米资源利用行为的减少。本区两周时期作物种类多、出土数量多，与龙山文化多有相似者，惟小麦比重提升、稻遗存比重下降是该时期新特点。

(四)鲁西南地区

商时期的十里铺北遗址所出粮食承前，构成方面，以粟的比重最高，黍和大豆次之，稻和小麦最低，反映了先民对不同种类粮食资源利用及相

表五// 鲁西南地区十里铺北遗址商周时期粮食作物量化信息表(%)

作物种类	十里铺北·商			十里铺北·东周		
	数量比例	重量比例	出土概率	数量比例	重量比例	出土概率
	n=26326	n≈141	n=106	n=575	n≈8	n=45
粟	97.76	55.13	92.45	81.57	18.34	95.56
黍	0.77	0.87	57.55	5.91	2.66	44.44
稻	0.06	0.25	9.43	0.17	0.29	2.22
稻基盘	0.01	0.04	1.89	0.17	0.29	2.22
小麦	0.04	0.37	7.55	7.83	27.57	35.56
大豆	1.36	43.34	45.28	3.48	44.33	17.78
红小豆				0.87	6.52	4.44

关农业生产状况。考古调查采样分析的十里铺、青邱垆堆遗址皆出土有粟遗存,暗示了粟作的存在。东周时期的十里铺北遗址所出粮食作物在前述基础上新增了红小豆;构成方面,仍以粟的比重为最高,小麦、黍、大豆次之,稻和红小豆皆较低。与前相较,作物种类增加、小麦比重上升与黍比重下降是新特点(表五)。这种作物构成状况可能意味着先民对不同作物的种植及利用态度。

商周时期的鲁西南地区对多种作物的栽培和利用是先民生业的重要组成,对粮食作物的强化利用是先民重要的植食资源策略。与稻和红小豆相较,其他粮食在时人食谱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十里铺、青邱垆堆遗址仅公布了粟遗存,十里铺北遗址的植物考古发现为先民的植食资源利用提供了证据。由于该遗址两个时期采样数量不等,采样单位性质有别,东周植物遗存种类、数量少于商时期,但整体上显示了一定相似性。商周时期无论粮食作物,抑或其他植物的种类皆与该遗址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植物遗存有相似之处。惟东周粮食种类有所增加,其他植物遗存种类呈现出减少趋势。从龙山文化至东周,稻遗存的比重不断下降,小麦遗存的比重不断上升,反映了农业发展趋势及先民对作物利用情况的改变。

(五)鲁北地区

商时期的大辛庄遗址粮食组合仍为五谷,构成方面以粟的比重最高,小麦最低。刘家庄遗址未出土稻,其他粮食组合及构成与大辛庄相似。马安遗址虽仅有1份样品,也出土有粟、黍、小麦3种粮食。桐林遗址不见小麦、大豆,余者与大辛庄相似。榆林遗址的样品数量虽少,但其浮选结果

揭示了多种作物共存的现象。此外,大辛庄遗址出土有零星大麻遗存。商周之交的黄桑院遗址仅出土有小麦、粟和黍;桐林遗址不见小麦,但出土有稻;宁家埠遗址的作物组合则为粟、黍、大豆。囿于工作性质,目前尚不足以据所出遗存进行作物构成状况的量化。

西周时期的催马庄遗址所出粮食遗存仅粟和黍。唐冶、陈庄遗址作物组合与大辛庄一致,构成方面,皆以粟的比重为最高,黍和小麦次之,大豆再次,稻最低。这种量化数据,暗示了同一区域同一时代作物结构的相似乃至一致性。此外,唐冶遗址出土有零星大麻遗存。东周时期的宁家埠遗址,所出粮食仅大豆、粟和黍;构成方面,粟的比重占据优势。桐林遗址的粮食组合为粟、黍、稻;构成方面,三者比重依次递减。阚家寨遗址春秋时期粮食组合为稻、粟、黍、大豆、小豆,战国时期增加了小麦;构成方面,粟的比重最高,黍和大豆比重次之,小麦再次,余者较低。陈庄、张沟遗址的植物考古结果中,皆系小麦、粟和黍的粮食组合。此外,城子崖、榆林、后李、粉庄、都北等遗址的浮选结果皆呈现出多种作物种植体系的特征,粮食组合及构成状况与前述遗址有相似性(表六一表八)。

鲁北地区商时期先民的粮食作物有粟、黍、稻、小麦、大豆等,粟、黍、大豆等可能是先民利用较多的资源。商周之际,先民所利用的粮食种类总体变化不大,但不同聚落所出遗存呈现出一定差异;两周时期,小豆也补充到先民食谱之中,但这一时期先民对稻资源的利用有所减弱,对小麦资源的利用有所加强,可能暗示了麦作的发展与稻作的衰弱。虽然诸遗址植物考古力度存在差

表六// 鲁北地区商周时期诸遗址粮食作物数量比例表(%)

作物种类	大辛庄1	大辛庄2	刘家庄	宁家埠	唐冶1	唐冶2	陈庄	桐林1	桐林2	阚家寨
	n=5745	n=17377	n=5131	n=4036	n=1100	n=37173	n=25806	n=110	n=820	n=1726
粟	97.51	81.23	94.11	95.52	97.18	97.61	93.95	82.73	95.85	95.25
黍	1.22	6.49	2.46	4.31	1.64	1.96	5.5	8.18	2.44	0.87
稻	0.77	6.68				0.05	0.01	9.09	1.71	0.06
小麦	0.38	0.13	0.18		0.09	0.32	0.32			0.23
大豆	0.12	5.47	3.25	0.17	1.09	0.06	0.22			3.53
小豆										0.06

注：“大辛庄1”指大辛庄遗址2003、2005年度浮选结果，“大辛庄2”指大辛庄遗址2010年度浮选结果；“唐冶1”指唐冶遗址2006年度浮选结果，“唐冶2”指唐冶遗址2014年度浮选结果；“桐林1”指桐林遗址商时期浮选结果(未合并)，“桐林2”指桐林遗址商周+西周时期浮选结果(未合并)。

表七// 鲁北地区商周时期诸遗址粮食作物重量比例表(%)

作物种类	大辛庄1	大辛庄2	刘家庄	宁家埠	唐冶1	唐冶2	陈庄	桐林1	桐林2	阚家寨
	n≈21	n≈238	n≈45	n≈14	n≈6	n≈124	n≈95	n≈1	n≈3	n≈16
粟	82.31	17.84	32.88	83.81	59.37	88.31	76.71	49.91	84.64	31.21
黍	2.06	2.85	1.72	7.57	2	3.54	8.99	9.87	4.31	0.57
稻	4.74	10.76				0.3	0.02	40.22	11.06	0.14
小麦	5.06	0.44	0.96		0.87	4.54	4.06			1.19
大豆	5.83	68.11	64.44	8.62	37.76	3.31	10.22			65.62
小豆										1.27

表八// 鲁北地区商周时期诸遗址粮食作物出土概率表(%)

作物种类	大辛庄1	大辛庄2	刘家庄	宁家埠	唐冶1	唐冶2	陈庄	桐林1	桐林2	阚家寨
	n=165	n=165	n=128	n=8	n=23	n=124	n=75	n=7	n=9	n=6
粟	69.7	98.8	99.2	83.9	100	96.77	97.3	71.43	88.89	100
黍	18.2	68.7	32.8	39	47.8	45.16	68	42.86	66.67	83.3
稻	11.5	39.9				1.61	1.3	42.86	33.33	16.67
小麦	3.6	8.48	5.47		4.15	30.65	46.7			33.3
大豆	1.8	70.5	39.8	22	30.4	6.45	26.7			83.3
小豆										16.67

异,但整体观之,本区内部的植食资源利用模式大致相似,即以粮食作物为主、其他植物性食物为辅。与本区史前时期相较,粮食结构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继承性。

综上所述显示,海岱地区商周先民的植食资

源利用承前,以粮食作物为主、其他具有食用功能的植物资源为辅,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商时期粮食作物种类与岳石文化无异,西周时期在五谷的基础上增加了小豆,东周时期又增加了绿豆及其他豇豆属、荞麦等。就区域农业地理来看,胶

东、鲁中南地区粮食作物资源的多样性高于其他地区。除工作尚少、保存状况较差的鲁东南地区外,其他区域的植物考古结果都显示了多种粮食资源利用的特点,且所利用的粮食类别较为相似。在植物考古视域下,商周先民的农业经济、生业模式建立在史前的基础上,汲取了史前先民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三、海岱地区商周时期农业复杂化进程

早期农业复杂化,是自早期社会复杂化衍生而来的概念。就目前国内的学术实践来看,已刊文献之中,陈相龙等学者较早使用此概念^[38]。约略同时,也有学者提倡此概念,并依据海岱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农业经济由弱渐强、由落后到进步、由简单变复杂的发展态势,分析了农业复杂化的主要表现:多种作物种植和多种家畜饲养的稳定与强化、域外栽培或驯化物种引入并稳定嵌入本地生业系统、粮食及家畜富余、与农业活动相关的工具种类增多与比重提升、时人定居生活趋势加强等^[39]。就海岱地区扁扁洞类型至岳石文化的考古发现来看,史前农业经济、生业系统的确存在由简单到复杂化逐渐演进的态势。时至商周时期,海岱地区的农业复杂化态势又有新的发展。

(一)商时期

海岱地区中晚商时期的植物考古记录中,粮食作物遗存比重在岳石文化基础上又有提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大辛庄、刘家庄、十里铺北等遗址植物考古数据体现出来了这种作物遗存比重提升所指向的农业经济发展态势。不但出土有植物遗存的遗址都出土有粮食作物,而且开展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皆存在多种作物遗存,而且样品数量越多,多种作物共存现象越明显。这种现象指向了先民稳定的多元种植制度。作物遗存中,粟、黍、稻、小麦、大豆五谷并存,经济作物大麻也得以种植。

另就动物遗存来看,这一时期的多种家畜养殖在龙山文化至岳石文化基础上又有发展。如滕州前掌大^[40]、济南大辛庄^[41]、桓台唐山、桓台前埠^[42]等开展过系统动物考古研究的遗址,多种家畜养殖并存,大致延续了龙山至岳石文化时期的特征并有所发展。另以开展过系统动物考古研究的阳信李屋遗址为例,即便它是位于距海较近、野生动物资源较为丰富的盐业遗址,但哺乳动物中也存在猪、狗、牛、羊等多种类别^[43]。这些发现从侧面反映了多种家畜养殖制度在海岱地区的

普及程度较广。

(二)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的海岱地区,粮食遗存比重继续提升,作物种类也在此前基础上有所增加。这一时期农业种植的进步尤以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唐冶、陈庄等遗址的考古发现最具代表性。除五谷、小豆外,大麻的种植传统得以延续。这一时期的考古记录中,小麦在农业结构中的稳定性与重要性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得以提升。

动物遗存方面,猪、狗、牛、羊仍是先民多元化养殖体系中的主要家畜类别。滕州前掌大、寿光双王城、广饶南河崖^[44]等遗址的考古记录指向了先民肉食资源的多样化。总体而言,在多样化的肉食资源利用模式中,来自于家养动物的肉食贡献率高于野生动物资源。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来自于区域、聚落级别、聚落性质、考古发现程度等因素可能会导致单个遗址记录的差异,但总体上看,家畜养殖在岳石文化既有基础上继续往前发展。

(三)东周时期

海岱地区东周时期植物考古记录丰富,出土植物遗存遗址的数量、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数量皆胜于岳石文化、商及西周时期。作物组合中,除此前已出现的种类外,荞麦及绿豆等豇豆属也逐渐融入到先民生业系统之中。植物遗存数据指向的小麦种植比重的提升、水稻种植比重的下降在岳石文化至西周时期的基础上有更加深化的发展。这种农作物种植类别、种植制度、种植规模的变化,可能与环境变迁及国家层面政治扩张的历史背景相关^[45]。随着作物种植重要性的提升及作物种类的增加,时人越发离不开农业生产,食物生产对食物资源的贡献率也在此前基础上更进一步,农业社会进一步强化。

动物遗存方面,多种家畜养殖制度继承岳石文化一晚商—西周以来的模式,长江仙人台、枣庄小邾国、新泰周家庄^[46]、滕州东康留^[47]等墓葬随葬动物遗存种类丰富,家养动物的多样化态势延续了此前传统,猪、狗、牛、羊等仍系先民饲养的主要家畜类型,牛、羊遗存占比在家畜乃至哺乳动物群中皆有提升,且在先民仪式性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指向了农业复杂化进程中的新现象。同前,多种因素都可能对单个遗址的考古记录产生影响,但综观动物考古记录的量化指标,家畜养殖业较此前又有发展。

前述植物、动物遗存以外,商周时期以农具

为代表的生业工具加工技术在此前基础上进步明显^[48]。以本区商代大辛庄^[49]、周代齐故城^[50]的考古发现为例,农具质地多元、种类多样、技术进步、数量比例较龙山文化至岳石文化时期有所提升。就社会复杂化程度而言,本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发现指向了复杂社会的发展与文明化进程的加速。早在史前时期已融入“早期中国文化圈”^[51]的海岱地区,在商周时期演变为中原统一王朝的重要组成,聚落结构存在大规模方国都邑、环壕聚落、中小型聚落等层级差异。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属于社会基础的农业经济乃至生业模式的复杂化态势。

综上,海岱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记录表明,食物生产、资源生产行为在本区史前诸文化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多种粮食种植及家畜饲养制度向前发展,成为先民生活中更加普遍更加固定稳定的组成。单以作物而论,史前稻粟兼作基础上的多种作物种植体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稻作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在多元化的农业生产格局中,麦作的重要性得以加强。从时代上看,商周时期稻作的弱化继承了岳石文化作物结构的特点,但麦作的强化趋势当不早于西周时期。

四、结语

综上,海岱地区商周时期农业经济在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就作物组合与构成状况来看,不同的文化小区或地理单元或有一定差别,但总体观之,作物组合在继承此前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补充新的作物类型。作物构成延续了以粟作为主的多元化农业结构,但麦作强化与稻作弱化成为本区广域的时代特征。这样的作物组合与构成模式不但强化了既有的种植体系,而且为后续更多更新种类作物的种植奠定了生境和技术基础。综合植物、动物、工具遗存等多维记录,海岱地区农业经济不断强化,农业复杂化在龙山文化至岳石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不但为区域文化发展与社会演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融入到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组成之中。现有考古发现证实,与本区史前时期相较,商周时期农业经济乃至生业系统的探研力度有待加强。

另需说明的是,本文系以植物考古资料为中心的考古观察,部分兼顾其他考古证据,但对文献史料关注不足,而文献史料在探研商周时期农业发展状况中有很大学术潜力,今后若能有针对性地多学科考古证据与文献史料相结合,或可对本

区商周时期以作物结构为代表的农业地理格局、农业经济面貌及农业复杂化进程的认识更加深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显示,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农业复杂化有不一致的表现。随着材料、方法与理论的不断扩展,海岱地区商周农业复杂化进程的脉络将更加清晰。

(附记:本文的写作与修改得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戴向明研究员、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陈雪香教授的帮助,谨致谢忱!)

- [1]商周时期的海岱地区地理范围与史前时期略有不同,专指今山东省域(参见王青:《海岱地区周代墓葬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另需说明的是,鉴于本文作者已对岳石文化农业相关问题做过研究(郭荣臻、靳桂云:《岳石文化农业经济的植物考古新证》,《东南文化》2019年第1期),本文所涉商时期专指海岱地区中晚商时期的考古记录。
- [2]安静平:《山东地区青铜时代农业和野生植物利用考察——基于植物考古的证据》,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 [3]魏娜:《胶东地区周代农业活动和野生植物利用考察》,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 [4]烟台市博物馆、龙口市博物馆:《龙口市楼子庄遗址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十一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
- [5]赵志军:《山东烟台龙口归城城址浮选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龙口归城——胶东半岛地区青铜时代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公元前1000—前500年)》,科学出版社2018年。
- [6]a.靳桂云、王育茜、王海玉等:《山东即墨北阡遗址(2007)炭化种子果实遗存研究》,《东方考古》(第10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b.魏娜:《胶东地区周代农业活动和野生植物利用考察》,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20—23页。
- [7]魏娜、艾松林、郭荣臻等:《山东青岛河南庄周代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报告》,《东方考古》(第14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
- [8]魏娜:《胶东地区周代农业活动和野生植物利用考察》,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 [9]同[8],第48页。
- [10]靳桂云、王海玉、燕生东等:《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龙山文化炭化植物遗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 [11]王海玉、刘延常、靳桂云:《山东省临沭县东盘遗址2009年度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东方考古》(第8集),

- 科学出版社2011年。
- [12]陈雪香、方辉、〔美〕Feiman G等:《鲁东南几处先秦遗址调查采样浮选结果分析》,《东方考古》(第6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 [13]陈雪香:《山东日照六甲庄遗址2007年度浮选植物遗存分析》,《考古》2016年第11期。
- [14]张雪莲、仇士华、钟健等:《山东滕州市前掌大墓地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考古》2012年第9期。
- [15]a. 马方青:《山东邹城邾国故城(2015)东周至西汉植物考古观察》,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21—60页;b. 马方青、陈雪香、路国权等:《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2015年发掘出土植物大遗存分析》,《东南文化》2019年第3期;c. 宋霄:《2017年度邾国故城和东古城遗址植物大遗存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9—30页。
- [16]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编著:《兖州西吴寺》,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99、251页。
- [17]材料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朱超团队提供,实验室鉴定分析由笔者完成。
- [18]王珍珍:《山东滕州北台上遗址植物大遗存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52页。
- [19]靳桂云:《山东先秦考古遗址植硅体分析与研究(1997—2003)》,栾丰实、〔日〕宫本一夫编《海岱地区早期农业和人类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 [20]Chen Xuexiang, Yu Shiyong, Underhill A P, et al. Radiocarbon dating and stable carbon isotopic analyses of Neolithic and Bronze Age staple crops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area and their paleodietary implications. *Geoarchaeology*, 2018, 33: 309.
- [21]材料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实验室鉴定分析由笔者完成。
- [22]a. 靳桂云、方辉:《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植硅体研究》,《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b. 陈雪香、方辉:《从济南大辛庄遗址浮选结果看商代农业经济》,《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c. 宫玮:《济南大辛庄、刘家庄商代先民食物结构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28—80页;d. 宫玮、方辉、郭俊峰等:《商末气候变化对于稻作农业的影响——基于济南大辛庄、刘家庄遗址商代植物遗存观察》,《第四纪研究》2019年第1期。
- [23]a. 同[22]c;b. 同[22]d。
- [24]张飞、王青、陈章龙等:《山东章丘黄桑院遗址2012年度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2019年。
- [25]陈雪香、郭俊峰:《山东章丘马安遗址2008年浮选植物遗存分析》,《东方考古》(第5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 [26]魏娜、袁广阔、王涛等:《山东章丘宁家埠遗址(2016)炭化植物遗存分析》,《农业考古》2018年第1期。
- [27]吴文婉、韩辉、靳桂云:《济南催马庄遗址植物遗存分析》,《东方考古》(第7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
- [28]a. 赵敏、陈雪香、高继习等:《山东省济南市唐冶遗址浮选结果分析》,《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b. 安静平、董文斌、靳桂云:《山东济南唐冶遗址(2014)西周时期炭化植物遗存研究》,《农业考古》2016年第6期。
- [29]材料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朱超提供,实验室鉴定工作由笔者及魏娜完成。
- [30]材料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朱超提供,实验室鉴定工作由笔者及安静平完成。
- [31]同[19]。
- [32]a. 靳桂云、郑同修、刘长江等:《西周王朝早期的东方军事重镇:山东高青陈庄遗址的古植物证据》,《科学通报》2011年第35期;b. 靳桂云、王传明、郑同修等:《山东高青陈庄遗址炭化种子果实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 [33]宋吉香:《山东桐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47—48页。
- [34]a. 赵志军:《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B区第Ⅱ和第Ⅲ地点植物浮选结果及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759—782页;b. 陈雪香、马方青、徐龙国等:《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B区第Ⅰ地点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初步分析》,《中国农史》2018年第2期。
- [35]同[15]c,第30—36页。
- [36]材料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鉴定工作由吴瑞静、魏娜分别完成。因鉴定结果尚未公布,本文对具体鉴定结果不予讨论。
- [37]靳桂云:《山东地区先秦考古遗址植硅体分析及相关问题》,《东方考古》(第3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75页。
- [38]陈相龙、尤悦、吴倩:《从家畜饲养方式看新郑望京楼遗址夏商时期农业复杂化进程》,《南方文物》2018年第2期。
- [39]郭荣臻:《海岱地区史前农业复杂化的考古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3页。
- [40]袁靖、杨梦菲:《前掌大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728—810页。
- [41]宋艳波:《山东济南大辛庄1984年发掘动物遗存分析》,《东方考古》(第5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 [42]宋艳波、燕生东、张振国等:《鲁北地区殷墟时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海岱考古》(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 [43]宋艳波:《鲁北地区晚商到西周时期盐业遗址肉食消

- 费分析,《东方考古》(第12集),科学出版社2015年。
- [44]同[43]。
- [45]陈雪香:《中国青铜时代小麦种植规模的考古学观察》,《中国农史》2016年第3期。
- [46]宋艳波:《山东地区几个周代墓葬随葬动物分析》,《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
- [47]宋艳波、高明奎、王守功:《山东滕州东康留周代墓地随葬动物研究报告》,《海岱考古》(第十三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
- [48]a. 杨宝成:《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b. 刘兴林:《商周农具问题浅识》,《管子学刊》2017年第2期。
- [49]方辉主编:《大辛庄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
- [50]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编:《临淄齐故城》,文物出版社2013年。
- [51]韩建业:《略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江汉考古》2015年第3期。

An Archaeobotanical Observation on the Agricultural Complexity of the Haidai Region in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GUO Rong-zhen¹ JIN Gui-yun²

(1.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100006;

2.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237)

Abstract: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available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s indicates that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continued to develop in the Haidai region in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following the advancement in the Longshan Culture and Yueshi Culture. The crops planted ranged from corn, millet, rice, wheat, soybeans, barley, buckwheat, red beans, mung beans, and cowpea to hemp.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existed between regions and time periods. What remained strong was the trend of wheat crops intensifying and rice crop weakening. Combined with zoo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it can be argued that agricultural complexity further developed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and the Haidai region was included in the wave of early food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Haidai region; Shang and Zhou periods; crop structure; agricultural complexity

(责任编辑:黄苑;校对:张平凤)

『東南文化』2023年第5号主な論文の要旨

1. 農村遺産の歴史文化を説明する主題の枠組みの構築と応用について(趙曉梅)

要旨: 遺産の実践は専門化された保護から大衆化された教育への移行をしており、遺産の説明は学術研究の成果を社会教育資源に転化する科学的手段であり、文化遺産の利用、伝承を実現することができる。農村遺産の説明対象がばらつき、地方の特色の欠如、歴史文化の内容発掘不足、文化主体の表現不足などの問題に対して、公衆教育の原則を堅持し、農村集落の生態、文化、社会的意義、農村システムと時空次元を踏まえて、農村遺産の歴史文化に焦点を当てた主題説明の枠組みを構築する。浙江省少妃、広西チワン族自治区金江河、江蘇省石臼湖の3つの村の遺産地で、ダイナミックな社会ネットワーク、多様な文化交流と生活パターンの融合をテーマにして、テーマフレームワークの運用方法を示し、この実践ツールの応用可能性を明らかにした。

キーワード: 農村遺産 遺産説明 歴史文化内容 主題の枠組み 複合型遺産 少妃 金江河 石臼湖

2. 江蘇省常州市新北区蔣家墩遺跡新石器時代遺跡発掘概報(南京博物院 常州市考古研究所)

要旨: 常州蔣家墩遺跡は寧鎮地区で発見された台型遺跡で、主に新石器時代と商周時代の遺構が含まれている。この遺跡で検出された新石器時代の遺構のうち、遺構は主に灰坑で、石器、土器、骨器と少量の動物と植物の遺物が含まれている。C14年代測定により、この遺跡の絶対年代は約7300年前と推定されている。蔣家墩遺跡は寧鎮地区で発見された比較的古い時代の先史遺跡の一つで、駱駝墩文化の起源と中国東部の先史文化交流の研究に新たな材料を提供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 蔣家墩遺跡 寧鎮地区 新石器時代 駱駝墩文化

3. 海岱地区商周期農業複雑化の植物考古学的観察(郭榮臻 靳桂雲)

要旨: 植物の考古学的証拠の総合的な分析によると、海岱地区の商周期農業経済は龍山文化—岳石文化の基礎の上で引き続き発展して、作物の組み合わせは粟、キビ、稲、小麦、大豆、大麦、そば、小豆、赤豆、緑豆、ササゲ属、大麻などを含む。惟麦作の強化と稲作の弱体化はますます進んだ。動物考古学などの他の証拠と合わせると、商周期に農業の複雑化が進み、海岱地区も初期の食料のグローバル化の波の中に組み込まれたと考えられる。

キーワード: 海岱地区 商周時期 作物構造 農業複雑化

4. 嶺南地区の両周時期の銅鼎に関する二つ問題について(呉 桐)

要旨: 南遷湖南越人の強い影響下で、春秋末期を境に、嶺南銅鼎の機能の特徴は「貴重品」から「礼器」に変わり、伝播方式は「非中心—中心」から「中心—非中心」に変わった。墓のランクに応じて明らかに政治化の傾向を示すと同時に、地域内の社会関係は「分化」を主な特徴としてきた。外来の要素と地元の伝統があいまって、共に嶺南百越族の社会発展態勢に影響を与え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 両周時期 嶺南地区 銅鼎 機能と伝播 墓ランク構築 地域社会関係

5. 始皇帝兵馬俑国際巡回展の歩みとその多様な解釈(陳 曦)

要旨: 秦と漢の2つの世代は、中国歴史では非常に重要な歴史的な時期であり、秦兵馬俑専門展は、我々の時代の精神と相互の文明交流の主なテーマは、黄金の名刺のような中国文物海外展示は、国際的な観客に愛されている。20世紀80年代以来、中国の文物外事政策、秦陵の考古学発掘と研究活動および国際博物館界の展示企画理念などの要素の影響を受けて、兵馬俑専門展は始皇帝とその時代の解釈に4つの段階の特徴を示している: すなわち好奇心を満たす「8番目の奇跡の意外発見」; ハイライトの「様々な兵馬俑と本物そっくりの工芸品だ」; 考古学的発見と多様な展示で浮き彫りになった「秦兵馬俑軍と秦の歴史発展の軌跡」及び多次元の解釈とデジタル化が補助する「秦始皇帝の貴重な遺産、秦陵の考古学研究と保護」だ。秦兵馬俑テーマ展示の多文化解釈は歴史的、多元化の特徴を持っています。当方と外国側の解釈は完全に対等ではない。

キーワード: 始皇帝兵馬俑国際巡回展 展示解釈 展示企画 中国文化 中外文化交流多元化

(翻译: 黄建秋)

『東南文化』2023년 제5기 주요 논문 제요

1. 「농촌유산의 해석을 위한 역사문화 주제의 프레임 구축과 적용에 관한 기초 연구」(趙曉梅)

제요: 유산 실천은 전문화된 보호에서 대중화 교육으로 전환되고 있으며 유산해석은 학술적 연구 성과를 교육의 자원으로 전환하여 문화 유산의 활용 및 계승을 실현할 수 있는 과학적인 방법이다. 중국의 농촌유산은 산재되어 있는 해석 대상, 모호한 지역적 특성, 역사문화적 내용 발굴의 부족함, 문화주체 표현 부재 등의 문제에 직면하고 있으며 농촌유산의 해석은 대중화 교육의 원칙을 견지하고 농촌 취락의 생태, 문화, 사회적 의의를 경유로 농촌 시스템과 그 시공간적 차원을 위시하여 농촌유산의 역사문화에 초점을 맞춘 주제별 해석 프레임의 구축해야 한다. 주제별 해석 프레임은 浙江省 少妃, 廣西省 金江河, 江蘇省 石臼湖의 3개 농촌유산에 적용되었으며 각각 동적 사회 네트워크, 다양한 문화 교류 및 통합된 생계 모델을 주제로 적용하여 주제 프레임의 적용 방법을 보여주었으며 이 해석 도구의 적용 전망을 보여주고 있다.

핵심어: 농촌유산, 유산해석, 역사문화적 의미, 주제 해석 프레임, 복합형 살아있는 유산(living heritage), 少妃, 金江河, 石臼湖

2. 「江蘇常州新北區 蔣家墩유적 신석기 시대 유적지 발굴 보고」(南京博物院, 常州市考古研究所)

제요: 常州 蔣家墩유적은 寧鎮지역에서 발견된 臺型유적으로 주로 신석기시대와 商周시대의 유적을 포함하고 있다. 유적에서 발굴된 신석기시대의 유적지는 회갱으로 석기, 도기, 골기, 소량의 동식물이 발견되었다. 방사성 탄소 연대 측정에 따르면, 이 유적의 절대 연대는 약 7300년이다. 蔣家墩유적은 현재 寧鎮지역에서 발견된 비교적 오래된 선사 유적지 중 하나로 낙타돈 문화의 기원과 중국 동부지역 선사 문화 교류를 연구하는데 새로운 자료를 제공하였다.

핵심어: 蔣家墩유적, 寧鎮지역, 신석기시대, 駱駝墩문화

3. 「海岱 지역 商周시기 농업 복잡화의 식물 고고학적 관찰」(郭榮臻, 靳桂雲)

제요: 식물 고고학적 증거를 이용한 종합 분석에 따르면 海岱 지역 商周시기 농업 경제는 龍山문화와 岳石문화를 기반으로 계속하여 발전하였다. 조, 기장, 벼, 밀, 대두, 보리, 메밀, 적두, 팥, 녹두, 동부, 대마 등을 포함한 작물 조합은 지역별, 시기별로 식물 고고학적 데이터의 통일성과 차별성을 가지고 있지만 밀 작물의 강화와 벼 작물의 약화 추세는 지속적으로 확대되고 있다. 동물 고고학 및 기타 증거와 결합하여 商周시기 농업의 복잡화는 더욱 발전했으며 海岱 지역도 초기 식물 세계화의 조류에 들어섰다고 볼 수 있다.

핵심어: 海岱지역, 商周시기, 작물 조합, 농업 복잡화

4. 「嶺南지역 兩周시기 銅鼎에 관한 두 가지 연구」(吳 桐)

제요: 남쪽으로 이주한 湖南 越人의 강한 영향으로 春秋晚期부터 嶺南지역 銅鼎의 용도와 특징은 ‘귀중품’에서 ‘의례용 그릇’으로 바뀌고 전과 방식 역시 ‘비중심-중심’의 형태가 ‘중심-비중심’으로 전환된다. 해당 고분의 등급 구성은 명백한 정치화의 경향을 보여주지만 이 지역 내 사회적 관계는 오랫동안 ‘분화’로 특징되었다. 외부 요인과 지역 전통 간의 경쟁은 嶺南지역 百越族의 사회 발전 추세에 공통된 영향을 미친다.

핵심어: 兩周시기, 嶺南지역, 銅鼎, 용도와 전과, 고분의 등급 구성, 지역 사회 관계

5. 「진시황 병마용의 국제 순회 전시 과정과 다양한 해석」(陳 曦)

제요: 秦漢시대는 중국 역사에서 역사적으로 매우 중요한 시기로서 진나라 병마용 테마 전시회는 중국의 시대 정신과 문명교류의 주요 선율에 부합하며 중국 문화재 해외 전시회의 황금 명함으로 국제 관람객들에게 큰 사랑을 받고 있다. 1980년대 이후 중국의 문화재 외사정책, 秦陵 고고발굴 및 연구 사업, 국제 박물관계 전시기획이념 등의 영향으로 병마용 테마 해외 전시에서 진시황과 그 시대의 해석은 호기심을 충족시키는 ‘뜻밖의 발견, 제8대 불가사의’, 하이라이트가 돋보이는 ‘각종 병마용과 생동감 넘치는 공예’, 고고학적 발견과 다양한 전시가 돋보이는 ‘진 병마용 대군과 진나라 역사 발전의 궤적’, 다차원적인 해석과 디지털 지원을 통한 ‘진시황의 귀중한 유산, 진릉 고고학 연구 및 보호’ 등 4단계의 특징을 보여주었다. 진나라 병마용 테마 전시회는 문화 전반에 걸친 해석의 역사성과 다양한 특성을 가지고 있으며 중국과 외국의 해석의 지위는 완전히 동등하지 않으며 국제 전시회는 여전히 국제 관람객과 마주하지만 여전히 뛰어 넘어야 하는 문화격차가 존재한다.

핵심어: 秦 병마용의 해외 전시, 전시 해석, 전시 기획, 중국문화, 中外교류, 다원화

(翻譯: 朴炫真)